

张苍水《游隆教寺》所蕴含的三大信息

□倪淡水 陈燕玲

张苍水《游隆教寺》原文如下：

云林次第望中收，碧涧清泉曲曲流。
山势有情留古寺，海潮无意到孤洲。
素冠却许黄冠伍，芳草浑同衰草愁。
自觉行踪犹落落，五湖烟雨钓鱼舟。

该诗出自张苍水诗集《奇零草》，清傅氏钞本《张忠烈公集》有收录。在张苍水的所有诗文中，这首《游隆教寺》并非是代表性作品，但是如果从舟山文史的角度予以考察分析，却可以发现，它蕴含着许多微言大义，透露出众多信息。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三条。

信息一：

明末清初时期，隆教院已经改叫隆教寺

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记载：“隆教院：县东北四十里，汉乾祐二年建，名降钱。皇朝大中祥符三年（有人说是元年，我们这里依据的是宋刻本）赐今额，常住田三百六十六亩，山一百六十一亩。”

有院产田和山合计五百多亩，说明南宋时期，这隆教院规模巨大。另外，这寺名“降钱”，显得非常世俗化，几乎一点也没有宗教的意蕴。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次查阅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发现类似的寺庙名称还有好几个。譬如在“禅院”系列里，万寿院原名永福，保安院旧名保安；在“教院”系列中，超果院原名资福。名为“资福”的还有另外两个院。在“十方律院”里还有广福院，其旧名崇寿。这些寺院名称可以说明，在舟山早期的信仰文化中，充满浓厚的追求福、寿、财富的世俗愿望。

但是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它记载的是“隆教院”而非“隆教寺”。这“院”“寺”之别，蕴含着很大的信息。

“院”，属于“律院”。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为“昌国”卷。在涉及昌国崇信场所方面，它的记载细分为神庙、宫观、禅院、教院和律院五大部分。这充分说明，早在南宋早期，虽然普陀山还没有被明确为观音道场，但舟山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律院”又分为“十方律院”和“甲乙律院”两类。根据《佛学大辞典》，唐代不分教、律，概称禅院。宋代随着天台等诸宗的兴起，佛教开始分流派，教院出现，禅、教并立。所以这里的“汉乾祐二年建，名降钱”，虽然没有明确说究竟是“降钱禅寺”还是“降钱教院”，但根据《佛学大辞典》上述解释，由于其建于宋代之前，凡是寺院，都叫“禅院”，所以其应该为“降钱禅院”。

所以按照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理解，宋宝庆时期的“降钱禅院”，已经改名为“隆教院”。不但寺名从非常世俗化的“降钱”，改为禅味很浓的“隆教”，连里面的“院”，也从“不分教律”之“院”，明确为属于佛教一种支脉的“律院”。到了张苍水写《游隆教寺》的明末清初时期，挂在大门上方的，又已经从“院”，发展成更具有一般性佛教意义的“寺”。从此“隆教寺”就成了该寺的正式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信息二：

“素冠”“黄冠”“芳草”“衰草”，显示“隆教”的包容和博大

宋宝庆《四明志》记载说，到了宋大中祥符三年，皇帝亲自赐名，改“降钱”名为“隆教”。那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要隆的‘教’是什么‘教’，为什么这个时候朝廷希望‘隆教’？”

大中祥符，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而他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宋辽关系由对抗逐渐转向和解，实现两国一百年来

的和平。在宗教倾向上，北宋政府大多崇尚道家，宋真宗在晚年大建宫观，可见也是一个信奉道家思想的皇帝。所以我要问，他钦赐“隆教院”，希望舟山这样的江南海岛地区，兴隆什么教呢？

显然，“隆教院”并不是道观的名称。考虑到南宋南迁后，朝廷开始转而推崇佛教，更把普陀山列入“五山十刹”之中，正式确立为观音道场，我们认为宋真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并不扼杀佛教，而是佛道并存，要兴的应该是佛教，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信仰愿景。

张苍水的《游隆教寺》，为我们的上述理解，增加了一个注脚。

《游隆教寺》颈联“素冠却许黄冠伍，芳草浑同衰草愁”，分别出现了“素冠”“黄冠”“芳草”“衰草”四个意象。“素冠”的意思为白色帽子，指普通身份的书生，这里是张苍水自指。“黄冠”的意思黄色帽子，一般为道士所戴。僧侣一般穿戴深色的或黑或灰的衣服，即所谓的“缁衣”。有人认为张苍水在这里所说的“黄冠”，指的仍是隆教寺的僧人，因为高级别的僧人，有可能戴黄帽。我们认为推测可以，确指有待商榷。因为一者“黄冠”指称僧人，合理性不强；二者张苍水其他涉及僧人的诗文中，从无这种表述。如他《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的第二首尾联“迎门有灯火，僧话旧时踪”，直接出现“僧”字。

我们认为，这里的“黄冠”应该是泛指出家人，无须明确为道士还是僧侣。战乱时期，出家人四处飘零，只要有舍栖身，就不管是道观还是寺院。而“芳草”“衰草”所蕴含的信息，也是如此。它们都暗指各种漂泊之人，包括张苍水自己。“芳草”“衰草”面临的处境一样艰难，都是一个“愁”字，但它们都相互帮助，都在顽强地生存下去。所以无论是“素冠”“黄冠”，还是“芳草”“衰草”，都充分显示出隆教寺的一种包容和博大，乃至顽强和不屈。

信息三：

《游隆教寺》折射张苍水抗清斗争的矛盾心理

张苍水本质上是一个书生。我在2010年出版的《东海苏武张苍水传》里，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张苍水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他仅仅是一个书生。书生只知道“节”必须坚持，只知道“义”必须奉行，只知道“忠诚”是人之根本。他追求的是大道，而不是权益，不是地盘。

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所以他内心所向往的，其实是徜徉山水，歌吟烟霞，过一种宁静又富有诗意的生活。《游隆教寺》首联“云林次第望中收，碧涧清泉曲曲流”，即流露出这种人生态度。但是由于生不逢时，飘零海岛，绝望抗争，那种孤独和无奈感是非常强烈的。颌联“山势有情留古寺，海潮无意到孤洲”，“无意”“孤洲”等都显示出这种孤独和无奈。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有一天他来到了隆教寺，看到了出家人处变不惊的从容态度，不禁激发出强烈共鸣，引以为精神上的同道。尾联“自觉行踪犹落落，五湖烟雨钓鱼舟”，简直就是内心向往的宣言了。这与他在《月夜重登普陀山》（二首）中所表露的心迹是一样的。其一中的“渐觉浮生冗，何劳来去踪”，其二中的“鹤梦来何处？龙吟隔九重”，都清楚地表达了他如果抗清失败，就遁入空门的思想。

在舟山期间，张苍水几乎走遍了岛上的各个大寺，并多有诗作留念。一直到康熙二年，由于鲁王病死，张苍水解散了抗清义军，自己只带极少数随从，入孤岛隐居。张苍水终于有以平静之心来做“采薇吟”的机会了。对于他而言，这既是一种失败，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精神上的重新解放。他在《游隆教寺》所向往的“五湖烟雨钓鱼舟”，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是清廷不容许他存在，他只好在西湖旁边高吟“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走向与山水自然告别的最后霞光。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全球视野下的舟山海域灯塔

□张哲

宁波舟山港，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在宁波舟山港所在的舟山海域内，海路航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构成一张巨大的交通贸易网络，每一条航线上都星罗棋布地点缀着珍珠一样发光的灯塔，在全球贸易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舟山海域建起十余座灯塔

舟山海域的灯塔，最早多为简单的刻石示警，或是用立标指浅、烽火引航，佛塔指路等形式，为往来船只指示航路。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沿中国海岸航行的日记中感叹舟山海域，乃至整个中国沿海海域内皆无灯塔。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并不知近代灯塔为何物，更无法预知之后遥远的大西洋环流即将汹涌地拍向处于太平洋的中国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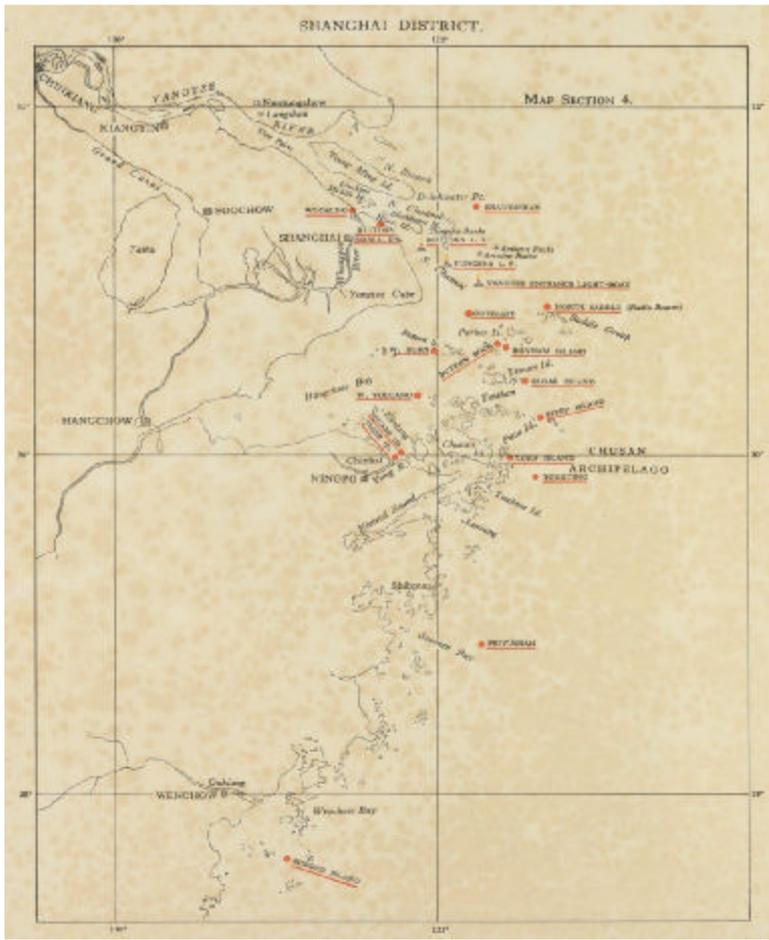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殖民地和海洋贸易的扩张，西方世界兴起一拨兴建灯塔的风潮，并席卷全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船只蜂拥而来。一方面，清政府应西方列强的要求开始在沿海开放口岸进行灯塔的建造；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海洋知识的传播，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灯塔对于航海的重要性，主动建设灯塔。

关于灯塔的知识，最早是由外侨学者提倡。1853年香港英华书院出版了一份最早的资讯性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在各大通商口岸广泛传播，1856年的某一期刊登了一篇名为《照船灯塔画解》的文章和一幅《海中照船灯塔》插图，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灯塔的创新技术与运作模式，并指出建设灯塔对于船舶航行指路避险的意义。随着西方灯塔知识的普及，近代灯塔开始在东方海域普遍兴建，并与全世界海洋上的灯塔衔接起来，连成灯塔链条。

随着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的开放，舟山海域成为南来北往船只的必经之地。但是这里群岛众多，台风频发、水文复杂、暗礁险区密布，在开放口岸初期，西方船舶在舟山海域内航行而触礁沉没的事件频发。正因为如此，后来任职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在拟定中国沿海灯塔建设计划时，将舟山海域列为首批重点区域。

舟山海域内第一批近代灯塔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即是由浙海关于甬江入海口处建立的虎蹲山灯塔(Tiger island)、七里屿灯塔(Square island)。

随后，大规模的灯塔建设计划实施，先后有大戩山灯塔(Gutzlaff island, 1869年)、花



《中国沿海灯塔志》所绘的舟山海域灯塔分布图(1933年)

鸟山灯塔(North saddle, 1870年)、佘山灯塔(Shawei shan, 1871年)、鱼腥脑灯塔(West volcano, 1872年)、白节山灯塔(Bonham island, 1883年)、小龟山灯塔(Steep island, 1883年)、洛伽山灯塔(Loka island, 1890年)、半洋礁灯塔(Button rock, 1904年)、东亭山灯塔(Tongting, 1907年，亦名外洋鞍灯塔)、唐脑山灯塔(South-West horn, 1907年)、下三星灯塔(Eigar island, 1912年)。

当时，由海关系统在舟山海域建设的灯塔，共有13座。但是，事实上，舟山海域内所建的灯

塔远远不止此数。因为近代灯塔与航海知识的普及，以及海关建设灯塔的示范效应，舟山渔民与商人认识到灯塔对于海上航行的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民间筹资积极建立了众多灯塔。

记载的有，清同治十年(1871年)，邑人金品三于长涂岛建立西鹤嘴灯塔；光绪二年(1876年)，普陀僧人募建普陀山短姑道头灯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普陀僧人又募建普陀山佛顶山灯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舟山金塘商人杨希栋等募资于太平山建立裂表嘴灯塔(又称太平山灯塔)；1917年，邑人刘德裕等募建沈

家门半升洞灯塔；1918年，闽商曾川流又募建沈家门外马峙灯塔；1927年，任筱和、任筱甫兄弟募建金塘菜花山灯塔(1915年任氏兄弟于象山石浦还建有东门灯塔)。

这些由民间人士建立的灯塔，有些是服务于商船的贸易往来，有些是服务于渔民的航海捕鱼。但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因为资金的短缺，这些灯塔往往交付给政府管辖，成为官方运行管理的灯塔。

二、激活历史灯塔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舟山群岛自古就是长江各口岸通往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门户，处于对外贸易航线中的重要位置。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门户打开，西方国家通过海洋航行涌向中国沿海口岸，使得舟山在对外贸易航线中的重要地位更为突显。随着舟山海域灯塔的建立，这些孤立海中的灯塔，放出万丈的光芒，指引迷途，向南北连接上海、天津、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大西洋，乃至太平洋。

舟山海域的灯塔，从局部来看，一个个矗立在岛屿之上确实是孤立的“点”，但是将这些众多孤立的“点”连接起来，就组成了指引海上航路的“线”，而将整个舟山海域的灯塔连起来，则组成了一幅航海贸易图的“面”，舟山群岛上海塔上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每一个面之间交错互通，连接海域内外，无限延伸，穿越海界、国界，汇通着全世界。

对于中国而言，灯塔的建设意义非凡，它是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链条。一方面，灯塔的兴建与中国对海洋贸易的扩展关系密切，灯塔可被视为因应贸易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特殊“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灯塔的普遍设置，使得航运风险与成本降低，进一步促进了人员与物质往来，将中国与世界相连，从而形成“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全球化”。可以说，舟山海域的灯塔应海运而生，因海运而长，它们是近代以来海上贸易航线拓展历程的见证者，是重要的工业遗产，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如今在舟山海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十余座百年历史灯塔，它们与新建的现代化灯塔一起，构成了更为紧密交织的网，联通着全球的贸易船只。目前舟山海域历史灯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花鸟山灯塔被列入世界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时至今日，全球定位技术的普及，使得航海导航系统也发生了变革，传统灯塔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今天，如何激活灯塔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这是当代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浙江海洋大学历史学系